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 在法国服軍事勞役的華工

— 蔡夏 —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次战争是以德奥为首和以英法为首的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間为重新分割世界、掠夺殖民地和奴役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强盗战争。战争首先在欧洲地区激烈进行。

大战爆发后，德军很快便进入法国，占领了法国的部分领土，也使法国在人力上受到严重的消耗。大战期間，法国动员了约300万兵力，占全人口五分之一，其中陣亡、受伤、失蹤、被俘就在500万人以上。至于人民死于饥寒、疾病、瘟疫和战争屠杀的，更甚于军队而不可胜計。因此，人力补充的问题便紧迫地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法帝国主义除了继续从殖民地附属国多方搜罗炮灰之外，并且在1916年初，派遣武官陶履德（Trupitil）来华，勾结北洋军阀政府，在中国沿海口岸大肆招募华工，驱赴欧洲战场从事军事劳役。

这个时期的中国，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帝国主义除了直接操纵了北洋军阀卖国政权，使之俯首贴耳、唯命是从以外，还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进一步把它的魔爪伸入农村，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而随着资本主义商品广泛侵入农村的结果，又刺激了封建地主阶级消费支出的增长和对货币的大量需求，这样就必然转而对农民的压榨。因此，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的同时，封建势力的剥削也在与日俱增。试举江苏南通地租剥削递增率为例，如以1905年为100，1914年钱租即增为207%，谷租则为155%^①。

同时，代表不同帝国主义国家利益的各系军阀間为争夺地盘所进行的连年不断的混战，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为沉重的灾难。仅1916年到1919年

的四年期间，平均每年就有六省地区陷于战火之中^②。经年不断的战争造成军费的庞大支出。1913年军费已占政府支出26.89%，1914年激增至38.08%，1919年更达41.68%^③。于是中国人民的身上，又加重了一重负担。

伴随着兵祸而来的是天灾。北洋军阀除了热衷于不断的混战，对于自然灾害的预防，一概不闻。于是频频发生的天灾给人们所带来的危害，便更为深广而难于遏制了。1914年全国有水、旱、虫灾的田地就已达到660万亩^④，而第二年全国又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灾情：有浙、赣、皖、湘、鄂、粤、桂、鲁、豫、滇、甘、闽、奉天、黑龙江等省的水灾；四川的旱灾；河南的蝗灾；江浙的风灾^⑤。灾民遍地，无以为生。

因此，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由于天灾兵祸的连年交迫，广大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这就在客观上为帝国主义招募劳工提供了便利条件。

大战爆发后，北洋军阀政府先是宣布“中立”，但在帝国主义的胁迫下，皖系军阀也企图借参战之名，大举外债，扩充兵力，以达到武力统一中国的目的，遂悍然不顾人民的利益，于1917年8月对德宣战，参加协约国战争集团。

既然北洋军阀政府参战的目的仅仅在于依靠帝国主义，大借外债，大打内战，就不可能也不愿意把军队派往遥远的欧洲战场。这是和军阀利益相矛盾的。对这一问题，交通系的买办官僚如梁士诒等，早在宣战之前就已殷勤献策了。他们提出“中国财力兵备不足以遣兵赴欧”，主张“以工代兵”，“由商人出名，代政府负责”招募，则“本国政府不费分文，可获战胜后之种种权利”^⑥。北洋军阀政府就是这样采纳了旨在牺牲中国人民的“以工代兵”政策来向帝国主义输诚效劳的。

但梁士诒之流倡议此举的真正目的，却完全不在他们所谓的谋“战后之种种权利”。在帝国主义时代，这纯然是欺人之谈，是绝对办不到的。梁士

① 《中国经济年鉴》租佃制度（G）72。

②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09页。

③ 同上，第608页。

④ 同上，第618页。

⑤ 《东方杂志》国内外大事记及北洋政府部份档案。

⑥ 《三水梁燕孙年谱》（上），第300页。

詭之流是藏着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企图诱骗广大劳动人民为帝国主义战争服役、充炮灰，并在这场人数众多的人力贩卖中，赚取高额酬金，大发横财。他们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支持下，与法国公使康梯、法国军部代表陶履德几经磋商之后，于1916年5月14日正式签订招工合同，由梁士诒组织惠民公司，办理招工。

接着不久，协约国的另一成员国——英国，也为法国战线上英军的大量伤亡，相继来华招工。由此可见，招募华工赴欧，完全是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政府相勾结的一宗人力买卖。

二

1916年5月招工合同签订以后，惠民公司在天津正式成立。为了适应大规模的招工需要，惠民公司又在香港、浦口、青岛等地设立分公司。当时，招工的营利是巨大的。由于利之所趋，一时公司林立，纷起仿效。如香港利民公司、广州沙面志利洋行、上海兴业洋行、上海道信洋行等，都在同年成立。次年，英国也在威海卫、青岛、济南、上海、汉口等地开始招工。

为了诱骗贫苦群众应聘，人力贩子们提出了许多骗人的所谓华工“待遇”。如招工合同规定，华工抵法决不用于“战事职务”，“仅为各工厂及农务之使用”，为期三年或五年；在待遇方面，也列出了一个帐单，说什么每天食粮多少，蔬菜肉类多少，每年多少衣帽鞋袜；又规定作普通工的每日工资2佛郎至2佛郎50生丁，作机匠工的每日2佛郎至5佛郎50生丁等等。就在这套骗局下，在整个大战期间，法、英帝国主义共招去华工十四万六千九百二十五人^①。应聘者多为贫苦农民，兼有少数工匠。

华工的待遇到底怎样？这里我们先从招工公司的营利谈起。

惠民公司的招工合同规定：“公司……代招工一人，登船赴法国后，公司应于每工人得法币壹百佛郎之酬”^②。但实际还不止此数。据北洋政府驻法侨工委员李骏的调查，每口酬金实为一百四十佛郎^③。这是一笔极其可观的数字。以当时被招华工15万人计算，则招工赢利即高达2,100万佛郎之巨。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帝国主义在支付这笔巨款以后，随即将损失直接转嫁于华工，对华工进行残酷压榨来换得补偿。当时，华法教育会即曾指出：“凡公司营业之招募华工，……公司主人得优等之

酬报。所得酬报，即间接来于工价之减少。……为公司包揽募工之人，得次等之酬报。此亦于工人与雇主之间，多一层分利之人。直接募工之人”则视其“速募、多募增其酬报之数。”^④华工身受公司主、包揽头及直接招募之人的三重盘剥，以致抵法后，“不能得其本国（按指法国——笔者）优等之工价。低等与优等间所差之数，即以偿公司等之所得。因公司等得之利，虽名为雇工国之政府所给，然该政府仍向厂家索取赔偿。厂家既因募工每人出资若干，焉能不思取偿于低等之工价？此势所必然也^⑤。”此外，招工公司为了渔利，还采取了极其卑劣的行径，在招工过程中，各地都有强招勒逼的情事。1917年2月8日，广东省省长朱庆澜致外交部电称：“据曲江复称，惠民派人到县，輿論譁然，群情反对，旋有工人不愿迫勒，附事闹闹之事。”^⑥北洋政府陆军部调查员也有报告说：“长江各埠久有外人招募华工之事，近来日见其盛。且对于所招之人，非常虐待。一经应聘，即日起行。如解囚徒，自由全失”^⑦。所以，招工活动在当时就遭到了舆论的抨击，谴责这种行为是“贩奴”，要求政府制止。

华工一旦离开祖国，便完全置身于帝国主义的直接奴役之下，而备受蹂躏。华工所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和迫害，主要可从四个方面来看：

（一）生活待遇低劣。华工自登轮起，就开始遭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虐待了。华工赴法，须经四十天航程。船中“每日开饭两餐，茶三次，均有定量。而帐房及厨司，图舞弊分肥，势不给足量，故使工人饥饿，可向厨房另购，居为奇货”。“且作米饭，生熟不均，华工喧嘩滋事”。特别是“一日三茶”，原不足以解渴，尤当船行赤道热洋之际，乾渴难忍更甚。“狡猾厨司，则又以开水售人”，对华工肆行剥削^⑧。

华工在船上住宿的舱位也是最低等的，甚至

① 北洋政府侨工事务局：《侨外华工调查统计表》。

② 《三水梁燕孙年谱》（上），第319页。

③ 北洋政府驻法侨工委员李骏第一次调查报告。

④ 华法教育会致北洋政府内务部关于组织侨工机关意见书（1917年9月20日）。

⑤ 同上。

⑥ 朱庆澜致外交部电（1917年2月8日）。

⑦ 北洋政府国务院致内务部函（1917年4月6日）。

⑧ 同③。

“即貨艙平日原弗搭客者，亦为工人下榻之地”。由于人多艙挤，艙内空气混浊，卫生恶化，以致疾病丛生，患热症者尤多。侨工委委员李駿某次亲随华工同舟赴法，他写道：“热病临身，即入痴迷。神經錯乱，行非由衷。是以途中潜出病院而投海者三人，病故船中者一人，移診西貢病院者又一人”，而“其他种种病症，不一而足。有时通譯竟不能得其名传达医生，而医官又以人多，时忽职务，故极困难”^①。可見华工在赴法途中所遭受的痛苦情况。

华工經四十天航程，抵达法国以后，其待遇仍然是沒有得到改善。

华工是在欧洲酣战的第三年来到法国的。战争給交战国人民带来的是空前的貧困、破产和饥饿。随着法国劳动者生活的急剧恶化，华工也遭到了帝国主义各种不平等待遇的欺虐。1917年秋弹盖而克工厂的馬肉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按照合同的規定，华工每日应得180—200克的肉或魚类供应，但法方却以华工“所汲厌恶”的馬肉充之。华工遂起交涉^②，由于华工的堅决反对，法方才被迫改为供应其他肉品。至于各地华工因“食粮不足”而挨餓，或因“飲食太劣”而“时生怨望”的，就更为平常了。

其次，在衣服方面，虽經合同明載半年一发，且費用已于每日工資內扣除，然法方竟違約迟迟不予发給。1917年秋，在下賽納河省区的哈佛来子弹厂、鴉雷威造船厂、魯昂河运公司、瓦賽火药厂及格郎古龙鍊鋼厂的华工到“寒季已近”，“尚未得領衣物”。且有翁日国立火药厂华工在1916年欧洲“空前寒冷的冬天”之末，尚未得領冬衣^③。即使在按期发領衣物的地方，“然所发衣服，往往单薄破敗，不足御寒。而尺寸大小，又极不相称”^④，因“此种衣服取自陣亡軍卒”^⑤。1917年春，法方还变本加厉，悍然不顾已經扣除衣費的事实，竟强令发領新衣須以旧衣件相換。帝国主义背信弃約，苛待华工，由此可見一斑。

(二) 实际工資下降与汇价損失。大战期間，各交战国普遍发生战費支出庞大、財政赤字剧增的險象。各国政府为解救其財政困难，不顾人民生計，大肆滥发通貨，造成紙币贬值，百物飞騰。如法国的批发价格，以1913年为100，則1916年为187，1917年为262，1918年为339。但劳动人民的工資却仍停留在战前水平，实际工資因而急剧下降。华工身历其境，自然与法国人民同受其害。如华工不滿法方发給破衣坏褲，因有“自购衣物或自买布使人

作中国式衣。然在法一身寻常衣服，非一月工价莫办”，“盖法国近日生活，誠有所謂薪桂米珠之寒象……华工所得薪資几何？尤須內寄贍家，岂仍有余力以购衣服乎？”^⑥从这一例証，不难看出华工因实际工資下降而致生活困苦的情境。

佛郎贬值的另一恶果，是給华工带来汇价上的損失。1916年5月31日（招工初期）上海、巴黎間汇兌牌价为4佛郎20生丁合上海規元一两^⑦，1918年8月30日（大战結束前夕）佛郎贬值到須6佛郎82生丁始合上海規元一两^⑧。十五万华工以一日最低的工資2佛郎計，則30万佛郎于1916年5月31日汇至国内，可兌上海規元71,430两，至1918年8月30日便猛跌为44,000两。一日的工資，損失即达27,430两之鉅，使国内华工家属的生活大受打击。这种汇价上的損失，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借通貨膨胀之手，对华工血汗收入进行残酷掠夺的結果。

(三) 繁重劳役和軍事管制。在整个大战时期，交战各国統治階級都对人民实行了严酷的軍事专政。华工抵法以后，即受法国陸軍部殖民地軍队局及駐法英軍司令部的管轄，这样就被置于繁重的劳役和軍事管制之下。华工每日工作時間长达十小时，两周始准休息一次，如遇軍务紧急，則連这一日也被取消。华工工作又为粗重苦活，劳苦更重。据駐法英軍少校郝維士亲見：“有工人十余名，于二十二分钟工夫，将二十吨車一輪卸完，是每人十分钟工夫，計卸一吨之数。又曾見二十四名工人将一百三十吨糖，于三点钟功夫，堆砌完竣，是每人每一小时負有一吨半之重”^⑨。这一記述，赤裸裸地暴露了华工劳役之重。

帝国主义驅使华工服繁重的劳役，是通过对华工严行軍事管制来进行的。华工工作，均受軍士的監視与指揮，“遂致华工無論有理与否，对之不敢交談”^⑩。华工行动既受軍事紀律的束縛，自无自由可言。甚至連通信自由也被剥夺，軍方規定，凡

① 北洋政府駐法侨工委委員李駿第一次調查报告。

②③ 《北洋政府国务院侨工事務局第五次調查在法华工情形书》，第29及37頁。

④ 《东方杂志》15卷6号。

⑤ 同②，第35—36頁。

⑥ 《东方杂志》15卷6号。

⑦ 《时报》1916年6月1日。

⑧ 《时报》1918年8月31日。

⑨ 《东方杂志》15卷8号。

⑩ 同②，第45頁。

书信统須送呈檢閱后，始准付邮。华工深致不滿。

当时各地对华工都設有“拘留所”，每遇华工“犯規”，輕則罰款（扣工資三至五日）；重則拘禁（三日至两周）。“然在法国，則非作姦犯科，經裁判后，不得处獄禁之罰”①。这种不平等待遇虽經交涉，皆被法方所拒。法方狡称：“按此項罰例，实为一种保护方法。利于不通吾国风俗习惯之外国工人身犯重咎而不自知之者。”②这种詭辯，正好暴露了帝国主义欺辱中国人民的可憎嘴臉。

在軍事管制之下，华工仅仅为爭取改善待遇問題，就会遭到残酷的軍事镇压。如弹盖而克厂因临近战綫，屢遭德軍炮火及飞机袭击，华工生命深受威胁，要求迁移到安全地带，法方不理。1917年9月2日，又有炮弹多枚直墜华工住所附近，华工次日全体罢工抗議。法方竟調宪兵镇压，造成华工被枪杀2人、受伤8人的流血慘案。类似的慘遭軍事恐怖镇压事件是不胜枚举的。

（四）无辜遭受杀害。大战爆发后，德国为了从海上打击协約國的軍事力量，于1917年1月宣布实行无限制潛艇战，对海上过往船只，見即击沉，不予余留，华工在赴法途中因而罹难者甚众。有名的河德斯号事件就是在这年2月17日发生的。法船河德斯号載华工七百二十名赴法，在經過地中海时，被德潛艇击沉，华工慘遭灭頂者五百余名。据曾彝进1918年11月1日向国会报告說，赴法华工在“中途遇难及死于潛艇，有案可稽者，已有三千余人”③。如果加上无案可稽者，毫无疑问，华工无辜牺牲的数字将更为惊人。

华工即使侥倖避过海上危难，抵达法国，生命也还是没有保障。如前所述，华工原是不得用于“战事职务”、“仅为各工厂及农务之使用”的。但华工一經抵法，就被法国軍事当局派往前綫担任掘战壕、筑工事、修公路、运弹药等危险工作，以致使华工遭到德軍的炮击，伤亡累累。例如1918年3月，德軍进攻亞眠，英軍自索姆河败退，华工被迫在火綫內以矿鏟为武器，向进逼德軍肉搏自卫，是役华工二千人被屠杀。就是被分配到战綫后方各兵工厂担任修造兵械、制造弹药等工作的华工，也經常遭到对方远射程大炮和飞机的袭击，伤亡不少。据梁氏年譜載，当时“华工死难者六万人”④。这个数字虽然不一定可靠，但它所供认的华工慘遭帝国主义战争大規模屠杀，則是确凿的事实。

以上一系列的事实，清晰地給我們剖示了帝国主义残酷剝削和欺压华工的真相。同时也說明了帝国主义是如何阴險恶毒地把中国人民从饥饿的死亡

綫推向战争的死亡綫。

三

大战期間，由于法国統治階級政治上反动的增强，人民生活貧困化的加深，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更大大地鼓舞和促进了法国无产階級的革命斗争。1916年法国工人罢工314次，1917年就增加到696次。同时，在1917年底和1918年初，法国陆海軍中也爆发了一連串的起义。

法国工人、士兵革命斗争的高涨，使朝夕与法国工人相处、身受帝国主义压榨的华工，不能不受到影响和鼓舞。华工在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下，反抗斗争也开展起来了。

华工反抗斗争的事因很多，如因飲食太劣、紀律苛严，或违約强迫至危险地带作工，等等。现将大战期間在法华工反抗斗争的事例列表于下⑤：

时 間	地 点	斗 争 方 式
1916年11月	冷內兵工厂	罢工
11月8日	瓦賽路火药工厂	华工全体“扰乱”
1917年1月	山峰火药工厂	“滋事”
1月	瓦賽路火药工厂	罢工
7月	山峰新火药工厂	罢工
7月12日	山峰新火药工厂	“叛乱”
8月	阿勿利欧工厂	罢工
9月	格朗古龙钢铁工厂	“滋事”
9月3日	弹盖而克钢铁工厂	罢工
10月及12月	巨賽三桥钢铁工厂	“扰乱”
12月1日	祿布山钢铁工厂	“滋事”
1918年2月	山狭馬火药工厂	“滋事”
2月18日	沙兰工程局	“滋事”
2月19日	白来司脫海运局	“叛乱”
3月2日	祿布山钢铁工厂	“鬧事”
3月6日	安不来內軍需局	“鬧事”
4月13日	芒梭煤矿	罢工
4月28日	波蒙孟多铁厂	“鬧事”
5月	沙而不利工程局	罢工
5月18日	格拉畏而船厂	罢工
9月	蒙梭煤矿	罢工
10月	巴黎第15区煤气厂	罢工

（下轉49頁）

① 《东方杂志》15卷6号。

② 《北洋政府国务院侨工事务局第五次調查在法华工情形书》，第28頁。

③④ 《三水梁燕孙年譜》（上），第446及451頁。

⑤ 同②，第19—20、23—25頁。

要有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高尚品质和勇敢精神。而在他看来，最难得的是史识，其次是史才，再则是史学。他的这个见解在《史通》全书各篇中都可以体会出来，特别是在《辨职》篇里表达得最明白。说：“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应当附带说明的是，这段话的主旨只在于阐述“史之为务，厥途有三”，其中虽有几位史家的名字，不过是就他们的特长而为“三途”所举的例，并非对这几位史家总评价的次第。

刘氏所指出的历史家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可谓得到后世的公认。虽然清朝人章学诚曾为之补充了一个“史德”，但“史德”实际上是包括在刘氏所说的史识之内的。近几年来，有人将刘氏所说的三个条件，尤其是史识，根据我们现在的认识和要求，赋以新的内容，但这又是另外的课题，就不在此多谈了。

× × × ×

综上所述，我们肯定了刘知几是古代的

（上接38页）

华工斗争事例远不止此。当时有人记道：“罢工斗殴之举，时有所闻，西人遂有譏我华工好闹事。”^①李骏也写道：“然而法人招工乃陆军部之命令，所有办法，管理处分，均有军事气味。华工之不能受此拘束者，果生事故，交涉频繁，每至无方以善其后。”^②上述事例，虽然很不全面，但从这些片断的材料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华工反对帝国主义迫害的斗争规模和英勇反抗的精神。时人称颂：华工之团结力甚大，合众力而御外侮，颇有足称者。”^③

华工的英勇反抗，一方面使自己受到了阶级斗争的锻炼；一方面也由于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法帝国主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就起了配合法国无产

杰出的史学家，《史通》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有价值的著作。然而，还必须指出，刘氏终究是封建主义史学家，是以地主阶级的立场和观点研究历史、评论史学的。他在谈到农民起义领袖时，时常加以诬蔑，如说“陈胜起自群盗”（《世家》），“寇贼则黄巾、赤眉”（《称谓》）。而对于帝王将相则深为崇拜，如说“帝王苗裔、公侯子孙，余庆所鍾，百世无绝”（《书志》）。他认为史书内容所应包括的“五志”（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和“三科”（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也都是为封建政治服务的。他虽有許多论点能以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但终不能完全冲出封建名教观念的窠臼，以致在某些进步主张中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如他说：“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諱，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曲笔》）“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惑经》）这就表现了他的封建史学的阶级本质，而他所提倡的“直书”、“实录”更因而减色。所以，他对史学虽有重要的贡献，但由于他的理论与方法根本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当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局限性。

（续完）

阶级革命斗争的战友作用，共同打击了法国垄断资产阶级。

华工反抗斗争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最终迫使法帝国主义停止来华招工。据北洋政府侨工局的调查报告书说：“按惠民公司从前与法政府所订招工合同，未及满额，即行停止。事因该工人等到法后，扰乱滋事，诸案层见迭出，法政府……不易约束，遂停止招募。”^④这是华工反抗斗争所取得的辉煌胜利。

① 《东方杂志》15卷6号。

② 北洋政府驻法侨工委员李骏第一次调查报告。

③ 《东方杂志》15卷6号。

④ 《北洋政府国务院侨工事务局第五次调查在法华工情形书》，第25页。